

天神与天地之道

巫覡信仰与传统思想渊源

郭静云 著

天神与天地之道

巫覡信仰与传统思想渊源

郭静云 著

上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神与天地之道：巫觋信仰与传统思想渊源 / 郭静云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4

ISBN 978-7-5325-7713-2

I. ①天… II. ①郭… III. ①巫术—研究—中国—古代 IV. ①B99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53512 号

天神与天地之道：
巫觋信仰与传统思想渊源

(全二册)

郭静云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www.guji.com.cn

(2) E-mail：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www.ewen.co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浙江临安曙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59.75 插页 6 字数 1,238,000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100

ISBN 978-7-5325-7713-2

K·2067 定价：189.00 元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序

这本书极大地满足了我对于上古世界的好奇心，也激发起我进一步探索的强烈愿望。

创造那些瑰丽神奇的青铜宝物的年代，已经离我们三四千年远了。这些宝物在自己的生命历程中，虽曾有过灿烂与辉煌，然终被深埋于历史的尘土，以致淹没于世而不为人知，其后又因着偶然的的机会不断被挖掘出土，重见天光，吸引世人的注意，引发世人的好奇心而令其急欲解读之。人们想要知道，它们为什么是这样的造型，它们的构图方式为何那么奇特？那些制作这些器物的古人，又有着怎样的精神世界？

自宋代金石学诞生至今，对它们进行解读的努力可谓千年不绝，一代又一代的睿智之士，怀揣着极大的热情，前赴后继，殚精竭虑，苦求答案。现代考古学出现后，这种对于历史本源和古人精神世界的求索更甚于前，且使用了各种科学方法和手段。千年求索的成果不可谓不丰，奈何那些创造这些宝物的人们，已经渺远难稽；而与他们精神世界的沟通，则更像是在浓密的暗夜中前行。是故，对于那些青铜器的分析，对于其主人们精神世界的理解，虽然众说纷纭，著作充栋，亦不乏真知灼见，然而，总体来说，终不免似雾里看花、盲人摸象，令人感到难中肯綮的失望。直到读了这本《天神与天地之道——巫观信仰与传统思想渊源》，始有茅塞顿开、豁然开朗之感，恰似阳光照进暗夜，使三代精神世界的历史轮廓显明如晨。

诚如作者所言，这本书的主旨是透视中国青铜时代精神文化的源与流。不同于学界此前将郑洛地区的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视为中国青铜时代早期的标杆，本书以作者在其著作《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一书中所论述的史实为背景，进一步细化其叙述和论证，认为早期中国青铜文化发展的主流实为长江中游地区的石家河文化和盘龙城文化，石家河文化晚期（或称后石家河文化）可能为文献中所称的三苗和夏王国时代，盘龙城文化则对应着汤商王国时期。后来殷人南下打败汤商，吸收融合汤商的谱系和文化，并自称为商，是为殷商。书中以充分的事实说明，殷商是一个多元且整体化的上古帝国，具有系统的祭礼结构和信仰体系。这一体系先在汤商时期形成和成熟，后在殷商时期再吸收、消化而同化了多元的声音和因素，并加以整合；经周代传承，在西周后半叶开始变化，逐渐获得新的意义。总体而言，商文明宗教体系涵盖千余年甚至近两千年的

历史,直至秦汉才失传。所以,这本书实际上是以两商信仰体系作为探索的主轴和文化承前启后的关键环节:一方面,将两商文明视为多元的上古信仰总体化的“终点”;另一方面,又将其视为后期传统形成的“出发点”。

本书分上、下两编。上编通过对礼器和文献的分析,探索上古的神秘形象及礼仪;下编旨在探索商代信仰概念的哲理化过程及其如何成为易学、道家等传统文化的基础。全书大量运用考古材料,包括甲骨文、青铜器、玉器等精美礼器以及汉画等,也采用传世文献资料。得益于作者在考古学、艺术学、思想史、文献学、古文字学、人类学和文化比较研究等方面的深厚积累和敏锐洞察力,使其能够娴熟运用数量庞大、种类繁多的材料,条分缕析,娓娓道来,让这些静止的实物自己说话和表达,讲述它们各自内在的精神意义,将一个鲜活的古人精神世界立体、动态、清晰而完整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找到开启这条历史长廊的钥匙,始于作者在亲自观摩大量实物后,发现青铜器上似乎无处不在而又千变万化的夔龙纹,其实都有着“双”嘴口的结构。有此发现以后,具有人类学知识背景的人,就不难理解这一结构背后所关涉到的死与生的意义。作者继而透过对甲骨文的考证发现,双嘴夔龙形象正好就是商人心目中的“神”,夔龙即为当时的天神。透过进一步的疏理和考证,作者为我们描绘了商人心目中的天神形象:天神神能的重点在于“神降”(吐泄甘露),以实现天地之交、上下关联、万物之生。但是负责上下关联的神,不能只下降,亦须上升。自上而下的神降意味着盈生,而自下而上的神升即意味着死亡而再生。神龙负责一切万物的死生循环,并赋予人以神格化的奥秘形象,通过他可以衍生“神人”;商王一方面是自己祖先的后裔,同时也是由龙形神母所衍生的“神子”,所以拥有超越性能力,能获得神龙的保佑。

随着这扇大门的开启,书中逐步向我们描述和展示虎、凤和其他各种神兽形象在商时代的结构和内蕴,以及它们与相关神秘符号的关系,并结合祈卜仪式、颜色等等非直接叙述的形象语言的分析,为我们描绘了商文明系统而完整的宇宙图景:天中有帝,先王等祖先在他左右,天空四方有四风,在天上负责中与方的相合;天上另有龙负责降甘露,在天上通过吞吐实现上下之交,而地面之下的水中有乌龟,能感受天意而参加上下之交;作为神灵雨的甘露自天降于地,而太阳从地升于天,构成上下神明之交;此外,地上中央有王,负责使中央与四方相合,并共同供明德祭天;同时,人王从地的中央通达天中的帝。支撑这一宏大历史论述的证据材料包括考古材料和传世文献,对材料的分析和解释切合历史学和人类学的常识,同时作者又深具世界历史和文化的宽阔视野,故而立论下笔往往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可以说,这是我所见过的有关商文明精神世界最具系统性、也最令人信服的学说。

本书堪称鸿篇巨制,但却大而不乱,清晰有序,前呼后应,逻辑严密。全书贯穿一条上古精神文化发展的主线,即从信仰到思想,再从思想到信仰的发展历程。作者擅长结构分析,特别是在讨论两商精神文化时,紧扣各种表象背后在深层结构上的一致性,直视问题的本质、关键和核心,力求对商人的精神世界作全景图式的描写和整合式的观察

与分析。一般来说,结构分析倾向于忘记或忽略历史过程,本书却将二者进行完美地结合。书中表达的上古精神世界远不是静止的和平面的,而是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流淌和演进的。作者用很多篇幅讲述了两商精神文化如何逐渐在早期的土壤,特别是在长江中游早期文化的土壤中形成,到了西周又如何变化,而在春秋战国至秦汉时代又如何被哲理化和迷信化。所以,这本书充分展示了在上古史领域历史人类学研究方法的深度与魅力。我们从书中所看到的,是一条流淌了二千余年的人类精神文化的全景图式的历史长河。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源所在。鉴古方知今,了解根源无疑有助于我们理解自身文化。比如,读了这本书之后,就让我对众多文化传统恍然大悟,好奇心被满足的同时,亦因求知得真解而深感痛快。

这还是一本精雕细刻之作。那些汇聚到两千年历史长河中的无数干支河流,沿途的沟壑曲道、风浪暗流等等,无不需要作者作细致的观察和了解。这使作者既需要有宏大气魄登高望远而俯览全局,又需要能平心静气做入微观察和细致描画。正是受益于这种全局和细节的精确把握和掌控,使作者对于很多大家平时已经多见不怪的器物造型、思想概念和文化现象,能够做出独到的观察和解释,读来不由令人击节称赞。如作者注意到三星堆出土神树的底座上有一条神龙,树上有九只鸟,“在这扶桑树枝上有九只小鸟休息,第十只好像飞走了,正翱翔而使天空明亮,剩下的九只将轮流代替它。这里的十鸟象征十日,树上九鸟代表九日;另一只为当值之日,飞翔于天空,而不见于树……神树下有一条张开嘴的龙,把龙的形象也合为一体。笔者假设,这种构图意味着第十鸟晚上回来时,先进入龙口,即黑夜死亡在龙的身体里,到了早晨另一只起飞时,神龙吐它再生而坐在扶桑树枝上。这种构图形象完整地表达了甲骨文所记载的丧礼中神与日的关系”。此类观察精准而有趣的例子还有很多。

这不是一本容易写作的书。记得刚拿到二校样时,静云感叹道:“如果我不写《亲仁与天命》,早晚会有别人这样分析而写出来;如果我不写《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过一段时间也一定会有另一个人写得出来,因为这种史实隐藏不了很久。但是《天神与天地之道》,除了我之外,恐怕很难会有人再写这样的书。”这么说不是作者不谦虚,太过张扬,而是因为写作这本书实在太难,需要非常多元的知识背景和生活经验,而现实生活中,很少有人能够做得到。作者本人的阅历和学术功底为本书的写作打下了基础,而她写作期间的坚忍执着和所承受的身心之痛,亦是外人难以想象的。这本书从酝酿到写作,再到出版,历时十余年,基本上贯穿了作者在中文世界的全部学术生活经历。我两年前接触到这本书的初稿,那时大约只有六十万字的篇幅,但全书的基本框架已经形成。这两年中,我们生活与沉浸在这本书的世界里,其间的曲折与艰辛,难以尽道。比如,书中用到的很多甲、金文都需要用很大的电脑屏幕才方便处理,但由于各种原因,我们这几年生活工作奔波不定,没办法拎着大屏幕到处走,这使她经常只能在小小的手提电脑屏幕前看这些材料,一度导致视力严重受损。静云是一个责任心极强、对待工作极为认真的人,她认为把自己的发现和认识写出来,是一种责任。但是,研究和写作又是

一件极为耗费精力、折损身体的事,而且要写的东西太多太难,还要随时抽出身来应对和处理现实生活中的杂事和干扰,以致她经常生出一种生有涯而事未竟的忧患与感叹!

这本书并不容易读,但也并不难读。说不容易,是因为这是个讲求快读、轻读、读图、读短文、浅尝辄止的时代;也因为书中涉及的知识背景和所运用的材料,远远超出任何一个单一学科的范围,而当前我们的学术工作却仍以各种专业为局限,所以超出了很多人的专业范围;还因为书中的论述框架远远超出了当前教科书中的话语体系。说并不难,是因为,只要接受了书中的论述,书中清晰的条理就可以引导读者跟着作者的思路一路往前走,如果你对其中某些论证材料不够熟悉或不感兴趣,尽可以跳过去;每个章节在开头都会有导语,在后面有小结或结语,它们将问题和重点梳理出来,可以起到帮助和引导的作用。作者曾经在中山大学和台湾中正大学开设相关课程,每次都引起学生们的极大兴趣。所以,无论是专业研究者,还是业余爱好者,只要是对先秦历史和考古,对中国思想文化的源与流,对三代礼器与上古信仰主题感兴趣,只要能够静下心来,慢读此书,就应该能够从中找到有价值的东西或感兴趣的话题,甚或发现一个完全不同的上古世界。

此外,作者另一专书《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自出版以来,引起很大的关注和争论。由于受书中的主题和论述框架限制,当时没有办法将所有的证据和材料都写进去。对此,本书已有诸多补充和细化的论述,以后还将继续完善之。

郭立新

2016年3月6日

写于中山大学康乐园蜗居

摘 要

中国传统思想奠基于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而战国思想的背景,不仅代表当时社会思想,更可溯及三代乃至更早时代的天地与人生观念,滥觞于中国先民多元的巫觋文化信仰中。因为远在战国思想家将上古信仰“哲理化”之前,古人对天地的认识就已有长久的渊源与非常深厚的基础。古人常用神秘形象来形容其对天地的观念,这并不意味着古人不理解自然界,而是因为这些形象结构本身就是古人了解宇宙的方法。同样,战国时期的人用哲理辩论来探讨宇宙的本质,并不意味着他们比前人更加了解宇宙的规律,只是表明他们把前人的“形象语言”转变成另一种“思想语言”。

本书的目的为透视中国青铜时代的精神文化。此研究的基础是本人关于当时多元历史地图的探讨,以及对不同地区社会、文化、国家、文明及其关系的了解。这一基础涵盖一组多样的历史难题,如笔者此前所认识到的:中国最古老的长江中游楚系大文明及其历史阶段;从距今五千年前以来长江中游先民经过漫长的探索掌握青铜技术的过程,以及他们对神奇的冶炼产生的信仰与崇拜;硬陶与原始瓷器技术的发展及其对精神文化的作用;楚系文明在夏商之际的变迁;楚商(早商)所组成的信仰体系,其内在意义、多元的源流以及与该信仰相配的礼仪活动,并赋予特定礼器以特定的神秘作用,等等。还有:楚商时期其他族群与国家的信仰,其源流和内在意义,包括对吴城、三星堆等南方国家文化的讨论,同时也涵盖北方辽河流域、渭河流域、草原地带以及其他文化的脉络;楚商文明与其他文明互相影响的脉络;殷商时期跨文明帝国信仰的形成;两商之间的传承与失传的关系;商文明信仰在两周时期以及更晚期社会中的演化;信仰的哲理化及迷信化,等等。

本书研究成果,是作者多年知识累积的结果,从最早对汉代资料进行分析伊始,经过不断溯源研究,一路走到青铜时代以前的文化;再从远古的角度回头看战国秦汉文化的现象才得以看清;同时也可以看到商文明在这一漫长历史过程中的核心作用。早商时代在丰厚肥沃的文化土壤上建构了大王国信仰体系,并广泛影响到整个长江流域以及江河中原广大地区范围的文化面貌;在此基础上殷商进一步将不同族群的信仰整体化,而形成上古大帝国宗教。所以,两商文明一方面是多元的上古信仰总体化的“终点”,另一方面也是后期传统形成的“出发点”。

商文明信仰所展现出来的并不是零散的残片,而是完整的宇宙图景:天中有帝,先王等祖先在他左右,天空四方有四凤,在天上负责中央与四方的相合;天上另有龙负责降甘露,从天上通过吞吐实现上下之交,而地面之下水中有乌龟,能感受天意而参加上下之交;作为神灵雨的甘露自天降于地,而太阳从地下升于天,构成上下神明之交;此外,地上中央有王,负责使中央与四方相合,并共同供明德祭天;同时,人王从地的中央通达天中的帝。

这种信仰在当时文化中采用了与今天不同的语言来表达:即用神兽形象、神祕符号、祈卜仪式、颜色等非直接叙述的形象语言。所以,对我们来说,无论是观察礼器或阅读甲骨文,都是解读当时文化密码的方法,但是由于文化的系统性,不同语言所表达的内在观念是一致的。

本书分为两大部分。上编通过礼器和文献的分析,来探索上古的神祕形象,包括神兽与非兽形的“祖”和“帝”及其在历史上的演化,以及巫师的身份及礼仪。下编旨在探索商代无形体的信仰对象和相关概念,包括天地、四方、五色、神明以及若干易学和道家文化的关键概念在上古的信仰基础及其哲理化过程。

上编前五章着重讨论龙的形象,证明中国崇拜龙神的大文化传统滥觞于上古农民对昆虫幼虫的崇拜。农人耕地时可观察到地里很多昆虫有着独特的羽化神能。在大自然中,只有昆虫能自体化为鸟形,亦只有昆虫能暂死(变蛹)而再生升天。因此古人将昆虫神化,成为龙的形象与崇拜的最初来源。中国境内至少有两个地区可以作为昆虫崇拜的发祥地:东北辽西与长江中游平原地区。前者循着历史长河汇入中国多元文明大水系中;后者形成头尾两端各有嘴的夔龙的形象,并在青铜时代中国多元文明大水系中成为主流。

夔龙神纹滥觞于长江中下游互动衍生的大文化体系中,而成形于长江中游青铜时代文化中,即石家河晚期至盘龙城兴起之际。在中国青铜文化的发展中,在大洪水期石家河(三苗、夏)文明至大洪水后盘龙城(汤商)文明的变迁中,经济、政权、文化、社会生活皆大幅更新,并产生新的文明,而对夔兽神龙的崇拜成为该新文明信仰的基础和主轴。在商周时代的多元精神文化中,双嘴神龙信仰具有崇高、主导、跨文化的作用。正因为如此,从盘龙城一期到春秋战国时期,几乎所有的礼器造型,皆奠基于双嘴神龙母题,甚至在其他神兽造型上也都有夔神纹,就好像古代传世文献所记载,虫为一切生物的元素。

在殷商时期随着“宗教艺术”的兴盛,以双嘴夔龙母题基本图案作为基础,衍生出各种双龙交缠造型,包括各种饕餮图案。在所有的构图上,龙的头嘴、尾嘴都是打开的,并且,在构图上一定有成双的嘴:在历史发展中,夔龙饕餮的形貌多样化而涵盖了很多其他神兽的特征,但始终保留“双”和“口”的核心重点。这是因为“双”的观念的本质为死和生,而“口”是死生的进出口,双嘴夔龙、饕餮的主要神能就是以吞吐管理死生:神龙从天上吐下甘露,养育群生;在地上吞杀群生,使他们升天归源。双嘴龙的神祕符号,不

仅成为商周多样的“宗教艺术”造型的母题,同时也成为汉字“神”字的雏形。所以,依据当时社会的命名,可以将所有双嘴夔龙纹及其变体,统一称为“神纹”,因为当时神的唯一形象就是双嘴龙或夔龙,也只有双嘴龙或夔龙才符合当时“神”的概念。

甲骨文的分析补证、补充说明了商文明有关“神”的信仰的内容:天神神能的重点在于“神降”(吐泄甘露),以实现天地之交、上下关联、万物之生。但是负责上下相联的神,不能只下降,亦须上升。自上而下的神降意味着盈生,而自下而上的神升即意味着死亡而再生。神龙负责一切万物的死生循环,并赋予人以人格化的奥秘形象,通过他可以衍生“神人”;商王一方面是自己祖先的后裔,同时也是由龙形神母所衍生的“神子”,所以拥有超越性能力,而能获得神龙的保佑。

双嘴龙母题在将近两千年的时间中,一直被用在珍贵礼器和随葬品上。从殷商时期起,神兽样貌从原先相对单纯变得丰富多元,空中、陆上、水边和水里活动的动物,都出现在礼器上。中国文化显然相当多元,蕴含很多地方原来的独特的信仰观点,但这种“多元”似一条由许多大小溪流组成的大水系。对于这一水系的形成,殷商王族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殷商王族本身是一个多元的团体,原本没有很固定的信仰体系,所以有条件成立跨文化区域的上古帝国,接纳一切崇拜,并将其融化进自身的宗教体系中。因此,殷商时期虽有许多不同的国家、城邦和族群,但在高层文化中已形成了宽阔地域范围内共通的精神文化。崇尚神龙的主流文化,不仅影响各地,同时也吸纳了其他族群对别种神兽的崇拜,在想象力的激荡下,创造出各种混合的神奇造型;此后西周沿袭之。

在这一体系中,神龙一直保留独特的地位:神龙是一个跨越族群的天地联络者、死生管理者,而并不是某族的“图腾”,所以各代、各族的王都与神龙形象有关系。依笔者浅见,关于中国神龙信仰的讨论,均有一种常见的误解:将龙视为“图腾”。在新石器时代如红山文化对龙的崇拜或包含有始祖的元素,但是在商文明以及其所衍生的中国大文明中,龙的形象完全没有作图腾的含义。传世神话中同时保留神龙创生与凤鸟创生两种神秘创生的信仰,从中明显可见二者的核心差异:前者表达普世的生死、升天与再生信仰,并不带有某族群衍生或特权的意义;而鸟生信仰却带有具体宗族繁衍的概念。由于夔神信仰并不含图腾的成分,所以没有某族将“神”字用作族徽,而凤、雀等鸟类或牛、豕、虎、鱼、龟等神兽的形象,则在某种程度上蕴含着神秘祖先的观念。这表明神龙夔兽在商文明的信仰中有特殊地位,不宜与其他神兽混为一谈。现代普遍视龙为中国人的图腾,实际上误解了其信仰原本的意义。

商文明的众多神兽之间存在等级关系,而在这种等级关系中,夔神的地位无比崇高且具有普世性。与夔神等级相近的神兽,只有凤和虎,但后二者已没有普世性的作用,其他动物的崇拜意义更加受到限制,基本上只拥有各种协助的机能。

古人对鸟类的崇拜应该最古老,无疑也相当多元,不同的族群认为天上的鸟是他们的始祖,故用作族徽;或者把星辰日月视为各种天鸟,以鸟类象征天象。因此使用各种鸟形象的普遍性高,但凤与其他鸟类的区分并不明晰。

至于老虎的形象,其使用范围较明确:与表达政权力量有直接的关系,经常用作王室独特的崇拜对象和保护神,或作为统治者武卫的象征。虽然老虎崇拜源自江南和东北游猎族群各不相同的上古信仰,但是无论是华南或华北,对老虎的崇拜有一个共同的重点:即一方面包含有神兽通天信仰,同时也离不开大权威和巨大威力的概念。在某种程度上,虎表达崇高王位的存在,是王国时代王权兴起的标志性神兽;因此,崇拜老虎的传统形成时代较晚,是类似于王室图腾的信仰。在殷商帝国,老虎被视为保护王室和国家的神兽。接续历史的脉络,发祥地不同的拜虎文化在互相影响、混合的过程中,因为都涉及高层集权、神圣的王位信仰,最终导致殷商时期“神虎帝国”的形成。

虽然早商统治者族群并不是以老虎为始祖的信仰者,但虎方、廬方等南方大型古国网络主要应该是被拜虎族群统治;到了晚商,从东北南下的殷商王族也属于拜虎的族团。殷商对虎神的崇拜,还涉及四方边缘概念,即老虎被视为戍卫防守保护国境的神兽。至于崇拜鸟类的信仰,其涵盖不同的鸟类和不同的族群,其中也包括早商统治者族群。换言之,由于殷商王族是混杂多元的集团,没有明确的图腾,但以老虎为保护神,而早商的王室却是以玄鸟为图腾始祖。

纯粹从词汇对照可以发现,玄鸟与天凤的意思相同:“玄”字象征天,所以玄鸟就是天鸟,同时甲骨文里“鸟”与“凤”两个字混用,所以“玄鸟”与“天凤”是同义词。石家河晚期已可见以老鹰造型作为始祖崇拜的礼器。早商这种礼器较为普遍,并有很多老鹰在台上的造型,商代青铜器、玉器上的凤绝大多数似为鸷鸟的造型,据此推知,神话中的玄鸟始祖实为老鹰,老鹰也是天凤的最初形象。玄鸟信仰并不符合殷商王室视老虎为保护神的信仰,但却可以代表长江中游先楚文化脉络里的汤商。从早商礼器来看,被上层贵族视为始祖的鸟是老鹰,但同时也有对鹤、鹭等水鸟崇拜的痕迹,此外还有很多大大小小的族群把不同的鸟类当作自己的始祖,视之为本族图腾,用之于本族族徽。

除了将鸟类视为始祖的神秘形象之外,商代人还认为,昊天充满龙形和鸟形的禽兽,其中以神龙与天凤为主要形象。他们是群体的崇拜对象,他们的神能很全面,从负责招来风雨、雷电、霓虹、霞彩,升华到管理一切上与下、中与方的关系,将昊天的生命力降到大地、传到四土、盈地养生,又吞噬、剝落万生,依此负责万物之死生周还,同时还隐含着更加幽秘的占星术、巫觋文化的形象。

在汉代有青龙、朱雀、白虎、玄武,黄道四宫、四方、四时、四季形象,其形成时代应该不早于春秋,在此之前,这些观念皆以四凤的形象来表达。对四凤的崇拜涉及二分二至天象和农耕季节的重要性,所以四凤是很重要的求年对象。所以,商代凤的信仰涵盖老鹰生命鸟的形象以及对黄道星辰等天体即天象的崇拜,此外四方天凤也是管理天界气流风向的神禽。

在商代信仰中,神和凤分别负责“上下和四方”的天上空间,而老虎是地上或山上之四方四缘的保护神。在此空间里还有一个颇为重要的点:即独一无二的四方之“中”。在商文明信仰中,在人事,两商王朝的“中”是神格化的“王位”;而在天上除了群龙、群鸟

神兽之外,还有居于“中”的独一无二之“帝”,即永居于天中的崇高对象。龙和凤都在天帝手下,众凤可以说是天帝所派的“方官”,而众神可以说是天帝所派的“司命”,两者皆聆听帝令而从之。在此信仰中,几乎所有的崇拜对象,包括自然众神和祖先都是群体性的众神、众祖,只有上帝才是天上独一无二的崇高对象。

商文明“帝”的信仰应源自对北极天中的崇拜,而“帝”的字形也具体、充分地表达了其本义,不仅具体描绘了当时北极天中周围的天空概况,也保存了当时巫师推断北极天中位置的方法。这不仅符合商周信仰的内容,也符合当时重视天文观测的情境,并且从“帝”字的形构、用意来看,也和商代实际的天文状态相一致。

甲骨文极为常见的祭法是用“方”的礼仪祭祀帝以及用帝(禘)祭的礼仪祭祀方,皆涉及中与方的互补关系。这种中帝与四方的关系表达了商文明的核心观念:虽然天在上,而地在下,但万事万物并不是由天来独权主宰,天地互补交合才最重要;同理,虽然中有独主,但中与方之互补相合才是关键,所以不仅是四方来朝拜中帝,中帝也恭敬四方。并且,帝与方的关系不仅仅是表达空间关系,同时也涉及天上黄道四宫的星辰旋转,以及与其相关联的时间季节的循环周转。在地上中立的王也取象于天帝巡四方而恭敬国家边缘。

上帝的神能除了作宇宙原理之外,也直接象征和表达商王的神圣权力。帝永居于天中,所以位于地之中央的王是直接呼应上帝的,甚至可以代表上帝。所以地上之王既受上帝的支持,亦被其考验、受惩罚。并且,在地上之王为地中,王所关注的要点一样牵涉到中与方的空间观念:保护或破坏作为国家中央的都邑王城,或授权保佑国家领土之边疆。

换言之,商王室与上帝的关系密切,在位的王祈求天帝的授权和保佑,且死后升天永居于帝的左右,而构成天帝周围的“紫宫”(即相当于汉代以来宇宙观中的天上五宫之间中宫的星星)。不过,汤商贵族的自我意识并非单纯一元,是一种多元的天生信仰。其中玄鸟降卵是一种始祖从天上落地的形象,而扶桑十日的信仰,又从另一个角度描述汤商统治者是一个神圣的族团,而非单一宗族。在汤商王室信仰中,先王取法于日,死后入龙口而再生、升天。但是,日并没有崇高的统治权威,因为他们是十日,十个平等的兄弟。这种形象更符合表达联合城邦古国的协调体系,兄弟轮值做主。可是在十日兄弟之上另有崇高的独一无二的上帝天中,似乎是多国联盟与帝国至上权威同时并存。因此从十日到其与上帝崇拜并存,或许反映的是社会政权的演变趋势。

在商文明的造型中,除了神兽之外,还出现人形面像,笔者认为,神兽吞噬人头所反映的是献巫之礼的观念,头像被用来形容送升天宾于神,为同族人求得保佑的巫师,让他作为人与神之间的联络者,所以,这是巫师升天再生图。

商时代献巫礼俗以斩首作为神杀的方式,是故在造型上,神兽一定从头部咬噬巫师,或在神兽的牙齿间单独塑造巫头。笔者认为这些构图与用斩首祭法献人的礼仪,互存因应关系,表达的是同一系统的文化观点。这种观点的关键之处或许在于,古人认为

头部即人的“天”，独有升天的神能。这一观念，或许接近于战国秦汉时期人们所认为的，死者灵魂分为升天的魂与下地的魄。

商文明信仰蕴含了几个层面的形象：神兽、天象、时间、空间、人生，这些形象在上与下、中与方的关联当中，构成一个大的系统。神龙吞吐、虎食人、十日从扶桑升降，在商文明信仰中，从不同角度、用不同的形象，表达同一件事情：生命轮回的循环以及升天、再生的理想。自然界的十日，以及人间的巫覡为天地之间的联络者，这套信仰基本上是在长江中游汤商国家文明成形，同时已有多元的因素，蕴含了长江流域平地农耕社会与山地猎战族群的理想，并且在多元的基础上，重点凸显汤商贵族的族群信仰。

我们在理解古人的时候需要不断修正自己习惯的逻辑。神话化的神秘思考方式容许将不同的现象和说明合为一体且不相矛盾。在当时人的脑海里有不同的层次存在，所以将自己视为人格性祖先的后裔、老鹰的后裔、十日的后裔或者由神龙重新创生的神人等，在神话化的神秘观念中，并不产生矛盾。在他们的理解中，所有的现象包括人生，各有不同观察和认识的角度，所以从这些不同的角度来看，由人所生、由鹰虎所生、由龙所吞吐或乘日自生，都准确并不相抵触，且构成一个完整的信仰体系。这是上古文明观念的普遍特征。

古代信仰观念中同时包含有多种角度的看法，这种情况当然部分地源自多种文化的混合，但不仅仅如此，因为这也符合上古文明中人们常有的思考方式。就是因为这种思考方式，偶像化的龙与龟和抽象、不可偶像化的神降与明升的观念，都同时存在而无矛盾。直至战国时代后这两者始有矛盾，前者在神秘信仰中逐步民间化而改变其义，后者成为百家所探讨的哲学命题。

下篇讨论诸多抽象概念，一方面阐明战国百家所争鸣的命题，实际上都源自上古信仰的脉络；另一方面发现，信仰中的抽象概念与偶像崇拜毫无矛盾，两者表达同一脉络的文化观念。

上古信仰中有很多形象和偶像，其中不少是神兽的形状，能组成很多造型。但与此同时，已形成了一套不可造型或造型不具象的概念。用形象思考的方式是上古观念的特点，但这并不排除用概念范畴的思考方式，这两种方式互补相成。所以商文明既塑造了很多龙的具象造型，以描绘天神的存在，而同时使用抽象化的“神纹”，将龙的形象符号化成“神”字形图，刻在礼器上，以表达其神圣的作用；这均属于呈现神的不同方式。此外，一方面塑造龙和龟的相对造型，用来表达从上者降、从下者升以相交的概念；另一方面也使用抽象化的“明纹”，将“囧”（日、明）字形的符号刻在礼器的高处，以表达祭礼通天的目的；还创造抽象的“神明纹”，用来表达通天目标与天恩和顺，并寓意强调天地之交。又比如，通过精彩的神话，描述水下鳌形的鲛产生虫龙形的禹，以通达天上，鲛禹父子既是人格英雄，也是象征下界与上界的神兽；同时还用祭礼活动表达“神”与“明”相辅的目标，从安排祭礼的时间，到所用祭牲的颜色或种类等方面，都是在用不同的象征语言表达信仰的重点。

这种语言中有造型形象,刻纹符号、字形,制作礼器和择定牺牲的颜色、祭礼的时刻、采用的祭法,以及其他我们已难以厘清的做法。从甲骨卜辞另可见,商王经常向先王祈求对事情的支持,同时也会祈祷抽象的“下上”,向无名的对象祈求引导,这些祈祷与祭礼并不抵触,而是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呈现立体的观念,并构成一套虽有变化但仍可以看出其连贯性的信仰和祭礼体系。

上古信仰和先秦思想的宇宙观以及对造化规律的理解一脉相承,其观念的很多特色总体上可以用当时的“神明”概念来理解和表达。在先秦观念中,“神明”是以两个相对范畴组成的复合词,以此表达天地之交、天地之间的媒介。其“神”的范畴涵盖来自天的恒星神光和天所降神靈雨水质的神气,其“明”的范畴涵盖出自地的日月火质的明形,神与明互补相辅才能生育万物。天地不交,则无生机;有神明之交,天地之间便有了生机,所以“神明”所反映的实际是古人的“生机”概念,天地万物化生皆奠基于神明、由神明来决定,但绝不能因此而认为神明是个大神。“神明”之结合表达天地“合德”的状态,天地合德才有万物之生机。

上古信仰并不是寄命于天或寄命于地,而是追求天地之合、与其志同,相配天地“神明之德”。先秦宇宙观其实是以神明观念为基础的,并且因为古人认为人生与社会皆取法于大自然,所以无论是在自然、人生或社会生活中,“神”与“明”均是上下互不可缺的范畴。神明观从大自然扩展到社会,乃成为礼制与孝道的神明观,其观念的滥觞亦可见于商周信仰礼仪中。从西周以来,礼制“神明”观取法于自然“神明”观,且其目的是:社会学天地,保持像天地一样永久的生机。礼制神明观强调:配天地神明之德,以追求家族世世昌盛之生机,并将此概念从家族的生机,扩展到跨血缘关系的社会与国家。从战国到两汉,礼学仍沿着西周礼制取象于天地的做法,而模仿天地“和德”的规范,追求天与天下的沟通以及国家的调节和稳定。

商周时期人们通过各种礼仪表达他们的神明观,并追求天地之合、通天达神而获得天恩保佑。例如在当时象征天的幽与象征地的黄两种颜色之间,另加白色以象征地的产物有升天的能力,作地与天之间“明”的媒介。因此,古人采用白毛与幽(青)毛的牺牲以祈祷升天的成功,如达到死者升天(为此而普遍以白色为丧色)或祭礼到达天界的目的;或者采用白毛与黄毛的牺牲以象征从黄土中白日升天、死者乘日升天,到了汉代以后,“黄白”一词专门表达升天,特指神仙方术。

在上古信仰的基础上,形成了哲学“神明”概念,并很快跨越了其天降神、地出明的本义,而进一步衍生出很多哲学理论。礼制神明观在儒家礼学中得以发展,自然神明观则被易学与道家着重讨论。战国早中期思想家的讨论,还是接近于原始神明观的意旨,但是随着抽象概念的演化,战国晚期所讨论的神明观,其内涵越来越丰富,远超其本义。(不过,到了汉代,百家思想已然萎缩,而上古信仰中关于“神明”的本义已被忘记。)

除了表达天地各种关系、符合周易思想雏形的信仰之外,商文明中也有“道”的信仰,形容来源不明的“導”,一种崇高的指南,能够引导商王选择准确除灾的正道,出行之

前商王祈祷能掌握“尊”的指南。老子提出掌握“道”的目标，应源自古人所祈求的掌握“上尊”的意思背景，只是在商代信仰中，根本不描述“道”的内在，也不探讨“尊道”的来源。而自老子以来，“上尊”信仰被哲理化以后，思想家就开始热烈地讨论“道”义，并探讨尊道的来源与实质。在这一讨论下，道家思想历来提出过不同的看法，在战国中期郭店楚简老子语录中，将“道”视为天地万物之间的“昏”即相合规律，由此“道”概念与“天地神明”概念结合于共同的脉络里。

其实，通过一步一步地分析我们发现：商文明以来的信仰重点在于均衡相配。商文明并不是崇拜独一无二的大神的文明，一切神力都需与其他神力搭配才行。包括独一无二的帝，也必须祭拜其周围的四方；独一无二的“中”的权力并不是具有独一的极端性和主宰性，只能通过与“方”的搭配，才获得其重要性。天浩大，但是没有决定生命的权力，只有天与地相配才重要，并且如果天的神力过大，需要多祈祷，用各种神秘方式控制天并加强地的力量，天地相符、相合，才是万事成功的条件。这种均衡相配并不意味着恒定均衡，而是指相对力量弹性机动、互相胜败，但总体还是产生互不可胜的均衡相配的理想，这才是死生、兴衰不绝的循环。这种信仰从各种祭祀活动中都可以看到。

例如殷墟甲骨卜辞中屡次出现“下上若，授我祐”祈祷套语，请求上下护祐授权，商王祈祷“下上若”的重点不在笼括祭祀上下所有的神祇，而在于祈求天地交互，以上下共同授祐，来保障王事的成功。甲骨文又载“呼神藉于明”，即表达神降明升之相对性以及相辅作用，进行此礼仪之地称为“明”，恰恰相对于卜辞所呼祈的“神”；在神秘的占卜记录里，很多细节并非偶然和无意义，所以我们可以合理地推论，此处之“明”，大约是指某种空间概念，同时也指太阳初升的时段，借助太阳升起之力与天相交通，带去人间的祈求；并且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天神地明相辅才有“生机”，所以亦保证有受年。甲骨文另有很多用不同颜色牺牲的记录，其中的幽与黄相对，显示了殷人以幽、黄牺牲来象征天地相配的神力，追求天地平衡相合的状态。《易·坤》“龙战于野，其血玄黄”用形象语言表达天地相配，而殷商用幽和黄牺牲的祭礼，以皮毛幽黄色牺牲的血来体现这一形象。

从这些祭法可见：“相配”是商文明信仰的崇高理想。同时，两极之间所产生的“和”是中国文化传统思想的核心所在。虽然从殷商以来经过多次集权帝国时代，但多元的中国文明始终没有放弃上古文明观念的基础，即“和”的均衡概念；虽然历代帝国张扬天子的崇高地位，但君臣“合德”的理想一直被看作是社会思想的重点。

必有下才能有上，如果不重视下，上也无价值，上下不合，根本无生。必有四方才能有中，以四方的价值确定中央的价值；各有其权，各有其责，中与方相合才是稳定的空间。必有子才能有父，重视子才能重视父的地位，互相各有其责任。必有臣民才能有君，重视臣民才能重视其君的地位，君臣互相各有其职责，君臣为一德才能有稳定的国。这是从自然到社会一套完整的观念，在先商时期已可见其滥觞，所以非常古老、非常深刻，而一直未曾被完全打败。也正因为有如此意识，过度极权的秦或新朝不能长久。当

然,汉武帝极权的程度并不弱于秦,但他还是必须得保持上下平和的包装,采用很多非直接的政治手段,这就是文化基础的需求:直接极端不能成功,一定要达成上下之合的中庸。

虽然迄今所能看到的较完整的资料只是从殷商才开始,我们却不能依此以为上下相合的概念源自殷商。殷商只是中国最早尝试建立帝国的王朝,强调的是一元概念,所以上下平衡与相合的观念不可能是殷商所创造,而是孕育于早商或更早的长江中游上古文明的深厚土壤中。此一基础始终在礼仪中留下痕迹,直到战国时期进一步成为百家讨论的重点。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易和道的传统似乎最源远流长,滥觞于先商时期的精神文化,是下编讨论的重点。至于早期儒家和法家,因为多集中于社会问题,所以更适合讨论当时的社会背景,即便如此,还是蕴含了一些源自上古的观念。

巫觋文化信仰不仅有思想化的演变,同时也经历了民间迷信化的过程。在巫觋社会中,是极少数的人物掌握观察自然现象、了解天象地兆、确定历法、祭礼,而同时负责推算、占卜、解决社会所关注的问题。对自然界没有累积足够知识和经验者,不能承担作巫师的责任。这些经验也在代际间秘密传承,在社会内对其他人形成一种神秘感。

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慢慢地除了巫师以外,有越来越多的人掌握了这方面的知识。其中一些人将这些巫觋的知识重新思考,寻找事件更深入的起源和因果关系,这就是后来所称的“文人”。文人们进一步将巫觋知识发展为一套思想系统,同时将信仰转化成“哲学”。除了文人的思想系统之外,另一群人则让巫觋知识变成“民间习俗”并加以传播。这些人未必了解仪式、规定和禁忌的来源及核心理由,但他们模仿一些古巫师的做法,形成简化、朴素化的上古信仰模拟版本。这种“版本”在已经过观念哲理化的社会中,显然被视为是民间的迷信。但在我们做巫觋文化溯源的研究当中,绝不能将上古深入的信仰视为迷信,而是应该建立正确的认知:在上古社会中,巫师的活动事实上是人类认知宇宙和生命之崇高精神的方式。

目 录

序	1
摘要	1
绪论 时空范围与认识古人精神文化的方法要点	1
一、传统思想与上古信仰的背景	1
二、时空范围：重新确定“中原”地理概念的本义	3
三、中国上古文明的历史脉络	5
四、由世界人类历史的脉络探寻商文化之信仰	9
五、跨学科领域的历史考证方法	10
（一）分歧的学科无法达到洞察事情的目标	10
（二）对文献的解读：文献学所提供史学的“工具”	11
（三）考古学的“工具”	12
（四）考古与文献之外的史料	12
六、本书结构及相关说明	13

上编 昊天充满神兽：商文明祈天的信仰结构

导论：神兽崇拜及古代文明的精神——兼论研究方法的要点	17
一、形象与概念	17
二、上古信仰考证方法	18
（一）观察礼器纹饰的观点和解读方法简述	18
（二）神话研究的观点和解读方法简述	19
（三）礼器纹饰与古字象形意义的相关性	20
（四）采用自然界的知识	21
第一章 上古文明神龙形象来源的异同	22
一、神龙的自然性或虚幻性	22